

明清文學與學問在朝鮮的接受

沈慶昊撰* 林侑毅譯**

摘要

朝鮮時代之文人與僧侶，以漢文創作詩文，論述學術思想。而朝鮮後期的學者，也多以漢文記錄文學的想像與其思想。然而發展的過程中，學術的重心也有所轉變。朝鮮知識分子由重視禮教秩序，轉而走向尊重人的個性，積極在文學與著述中呈現新的現實認識。在此過程中，因對明清的文學與著述有所參考與接受，思想與文體的變遷是顯著的。本文即針對明清文學及學術對朝鮮後期文學與學問的影響，進行概括性的論述。本文成果可概述如下：其一，朝鮮朝廷與知識分子起初否定明代學術，亦未積極覆刊明代文集。至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始接受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學，刻劃自我獨特的文學世界。其二，朝鮮經學初以關照「義理」的方法為主，到了朝鮮後期，在經典解釋上，逐漸應用文字學知識進行訓詁作業。其三，朝鮮文臣則認為修身學與字學應當結合，故有重視小學的趨勢。

關鍵詞：明清文學、明清學術、朝鮮漢文學、接受、小學

* 韓國高麗大學校漢文學科教授兼漢字漢文研究所所長、韓國古典翻譯研究院資深編譯。

** 臺灣政治大學韓文系/中文系雙學士、韓國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科博士生、KGSP（韓國政府邀請外國人研究所獎學金）攻讀碩、博士學位臺灣獲獎人。

一、前言

朝鮮時代士大夫與儒生——知識分子、佛教僧侶等，以文言語法之漢文創作詩文，論述學術思想。而朝鮮後期的閭巷人與知識分子，也多以漢文記錄文學的想像與思辯行為的產物。

朝鮮時代知識階層須勤練科舉考試的科詩與科文，而在登科晉身朝臣後，幾乎不再使用科詩、科文的文體。又知識階層在官吏生活與日常生活中，儘管大量使用吏讀式漢文（即朝鮮式、韓國式漢文），卻未認定其為正式的漢文。因此，一般所謂朝鮮漢文學，乃指稱以文言語法的漢文所創作的與國家政治或外交相關的詩文，以及利用各種可反映士大夫階層日常的文體，所創作的展現美學意象的詩文，其中又以後者為最。

朝鮮的語言與文章	文言語法 (古文)漢文	唐宋古文、秦漢古文(擬古文)、小品	詩(含詞)	
		*古白話擬作文		
		駢儷文(四六文)		
		科文(科詩、科賦、疑義、科策)		
	韓國式(吏讀式)漢文	佛教漢文	朝鮮式古風	
		鄉禮		
		初期音讀訓讀複合文		
		狀啟等公文書		
	諺文表記 文與口語 (韓語)	告目、立案等行政及生活文書	朝鮮式古風	
		諺解		
		諺文生活文書		
		諺文書札、祭文、行狀行錄		
		諺文小說		

朝鮮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以憂患意識為主調，從遂行自我修養與強調責任倫理兩大方向，產出兩種不同樣貌的著作與文學。而在朝鮮後期，隨著士大夫階層的分化，庶孽出身文人、閭巷文人、女性詩人等逐漸擡頭，漢文學開展出多元多樣的主題與形式。自十七世紀起，實學派與朝鮮陽明學派系譜所屬的文人，賦予漢文學以其進步的思維方式與自主

的歷史意識；首爾地區的技术職中人與胥吏、庶類等，則在漢文學中追求其獨特的美學意識。

朝鮮知識分子由重視禮教秩序及支配體制，並以漢文學及學術著作展現此一理念，轉而走向尊重人的個性，積極在文學與著作中呈現新的現實認識¹。在此過程中，因對明清的文學與著作有所參考與接受，本文將針對明清文學及學術對朝鮮後期文學與學問的影響，進行概括性的論述。

二、明清文學與朝鮮漢文學

(一) 朝鮮時代對明代文學的批判與接受

自 1419 年永樂帝欽賜《四書五經大全》起，朝鮮世宗即於 1427 年（世宗 9 年）付忠清道、全羅道、慶尙道、江原道各道負責製版，並於 1435 年命各道監司得隨時上繳請印該書者的印刷用紙。1488 年明使董越所作〈朝鮮賦〉，於 1493 年以癸丑字刊行後，又於十六世紀初以甲辰字刊行、於十六世紀後半（明宗、宣祖年間）在全羅道南原整版。²1556 年的甲寅字本《唐音》以張震輯注本為底本，1515 至 1570 年間的丙子字本《元詩體要》以宋緒輯注本為底本。1560 年夏宏仲編《聯錦詩集》以木版印刷，1561 年賀欽《醫閭先生集》亦以木版印刷。其後，朝鮮使臣一行於 1572 年（宣祖 5 年）前往中國，就明代重修本《永樂大全》併記宗系辨誣一事謝恩，於回程時換得《崆峒集》。1549 年李東陽《懷麓堂集》以乙亥字刊行，³李東陽《擬古樂府》亦應於此時以甲寅字刊行，並於十七世紀末整版。⁴

直至十六世紀後，朝鮮知識分子方真正深入談論明代文學。

¹ 沈慶昊：《조선시대漢文學斗詩經論（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

² 金斗鍾：《韓國古印刷技術史》（首爾：探求堂，1981）；鄭亨愚，尹炳泰：《韓國冊版目錄總覽》（首爾：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79）；鄭亨愚，尹炳泰：《韓國的冊版目錄》（首爾：保景文化社，1995）。

³ 韓國國立圖書館一山文庫藏《懷麓堂詩集》，韓國高麗大學華山文庫藏《懷麓堂詩後叢》零本 1 冊與《懷麓堂文後叢》零本 1 冊，韓國高麗大學晚松文庫藏《懷麓堂文續叢》零本 1 冊。以上為乙亥字本。日本大塚鐙個人藏鑄字本《懷麓堂詩話》零本 1 冊，較康熙壬戌廖方達校刻本為舊版，故推測為「正嘉年間」刊行。據書封右側有「共四十六」墨書，推測該冊為《懷麓堂集》100 卷 46 冊的一部分。

⁴ 奎章閣藏木版本《西涯擬古樂府》上中下 3 卷 2 冊。至如明刊本，日本內閣文庫藏陳以忠校梓本《擬古樂府》2 卷 1 冊，同內閣文庫亦藏魏春刻本《擬古樂府》上下 2 冊。此外，內閣文庫藏日本安政五年戊午遊馬哈社藏梓本《李西涯擬古樂府》，其卷首題下刻有「何孟春音注」，然實際並無音注；版心下有「聯腋書院罷刷」字樣。

朝鮮朝廷批判明代思想具三教一致的傾向，在明代學者中，僅高度評價方正學與薛瑄。《方正學文抄》於十七世紀以韓構字刊行，然前後七子文集及三袁、歸有光、錢謙益之文集，在朝鮮並未重新刊刻，僅有中國本流傳，留下許多手抄本。

朝鮮後期的李宜顯在《陶峽叢說》（收於《陶谷集》）一書中，將自身收藏的明代文集分為四大類。①以義理學術發為文詞者，如方孝孺、劉基、宋濂與王守仁、陳獻章、李贄等；②學先秦諸子而創為新格者，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等；③學古而語頗馴者，如茅坤、唐順之、楊慎、歸有光、錢謙益與徐渭、袁凱等；④為廊廟經世之文者，如李東陽、張居正、葉向高等。又李宜顯選何景明（信陽）、李夢陽（北地）、王世貞（太倉）、李攀龍（歷下）為明詩四大家。

其中，王世貞文集以手抄本刊行。1653年（孝宗4年），申最選王世貞散文與茅坤散文，於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肅宗年間）以初鑄韓構字刊行。王世貞文集至十九世紀為止，歷經多次抄寫。⁵1772年與1773年的經筵上，亦曾講讀《弇州集》。⁶然而在《弇山堂別集》卷七的〈史乘考誤〉中，指出將朝鮮太祖視為「李仁任」之子，雖為一誤，不過李成桂實乃李仁任同黨，此段考誤，即為朝鮮朝廷所稱之宗系誣陷一事。又王世貞晚年師事優婆夷（upasika）曇陽大師燾貞，撰〈曇陽大師傳〉（《弇州山人續稿》，卷78），編成《曇陽大師蹟》。朝鮮知識分子幾乎不曾提及王世貞與佛教有關的事實，獨金萬重敢於《西浦漫筆》上85條中，稱「王元美晚年學佛，師事優婆夷燾貞，稱其師之言曰：『陸固禪矣，朱亦五十步之笑百步。』蓋以文公初從道謙，悟靈明之心，而其論心之體用，出於南禪知解宗；洛閩存養工夫，發自曹溪故也。」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接受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學，刻劃其獨特的文學世界。⁷庶流出身的申維翰，以擅長模仿秦漢文與李王詩（李攀龍、王世貞詩）享負文名。此時復古派的詩文評論，逐漸成為評價與重新解釋古典詩文的參考，並促成以先秦兩漢古文與盛唐詩、選體樂府、七言古詩形式為典範。

另一方面，李東陽作《擬古樂府》102首（西涯擬古樂府，1504年序），開啟連作詠

⁵ 如《弇文抄》（高麗大學藏）、《弇州文抄》（許薰，失傳）、《皇明大家》（京畿大學藏）、《明大家文抄》（李觀洙，梨花女子大學藏）等。

⁶ 「上曰：『……皇朝文章，誰為最奇？』仁孫曰：『李攀龍之文最奇。方孝孺之文，源於義理，而若以文章大家論之，則劉宋之後，王世貞最優矣。』」《承政院日記》，英祖49年8月10日。另參河至映：〈王世貞與朝鮮中後期漢文散文（王世貞與朝鮮中後期漢文散文）〉，《韓國漢文學研究》57（首爾：韓國漢文學會，2015）。（編按：頁碼不詳。）

⁷ 「大明文章，大抵務華采，而少真實。此其所以反不及於宋也。然其評隲文詞，極其精確，尋源流，辨雜俗，毫髮不爽。文以先秦為主，詩以漢魏為本。一篇之內，規度森然，要非我國人所可企及也。我東雖稱右文之國，於文章，效法不高，識見甚陋。自勝國以來，只學東坡（坡），泝以上之，惟以唐為極致，豈知又復有漢魏先秦也哉？」李宜顯：〈陶峽叢說〉，《陶谷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81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卷28。（編按：頁碼不詳。）

史樂府的形式⁸。清初，吳炎、潘耒章將圍繞明史的紀述、喜悲、傷感、慶頌、譏疾、美刺等作品，收於《今樂府》2卷中，⁹尤侗作《皇明樂府》（擬明史樂府，收於《西堂全集》）100首。李家煥於〈金士吉皇明樂府跋〉（《錦帶集》）中高度評價李東陽詠史樂府，批判尤侗《皇明樂府》筆力萎弱。自1617年被流放慶尙道固城的沈光世（1577~1624），仿李東陽《擬古樂府》作《海東樂府》（1617年序）44篇以來，連作詠史樂府的形式與體例，擴張、轉用為朝鮮私撰史書的一種形式，歌頌歷代舊史的《海東樂府》、《東國樂府》、《大東續樂府》等，與歌頌地方史的《江南樂府》、《汾陽樂府》等相繼出現。順帶一提，在水戶藩的《大日本史》編纂前後，出現擁尊皇論與名分論的私撰史書，此時賴山陽（1780~1832，名襄）仿李東陽《擬古樂府》，於1828年作《日本樂府》66闕，並於1830年出版。¹⁰

至朝鮮後期，胡應麟《詩藪》廣受閱讀，其「體以代變」及「格以代降」之說影響朝鮮文壇。十八世紀的丁範祖亦主張「體以代變」之說。此外，胡應麟高度評價盛唐五言詩神韻、氣概之說，與重視七言律詩的悟（「興象風神」）、法（「體格聲調」），藉由法的積習達到悟之境界的漸修說，遂成為朝鮮後期學唐的參考原理。

（二）對錢謙益的接受與批判

錢謙益（1582~1664）與吳偉業、朱彝尊、王士禎並稱清初四大詩人，於1638年孫承宗殉難後任東林黨領袖，1644年3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後，又於南京弘光朝廷任禮部尚書。他繼承憨山德清的法燈，以居士自居，排斥宋學的思辨性與明儒的恣意性，尊重漢儒的注釋，為顧炎武、黃宗羲以後清朝經學的成立立基。而在1645年5月南京陷落時，錢謙益降清，任清朝禮部侍郎，參與《明史》的編纂。1646年（順治3年）6月辭職歸鄉，皈依空門。1769年（乾隆34年），其著作《初學集》與《有學集》因多有毀謗清朝文字，遭禁止印行、發售、引用。1775年（乾隆40年）11月，於崇獎忠貞之上諭中，錢謙益被斥

⁸ 有明魏椿刻本《西涯擬古樂府》、清康熙38年嶺南刻本《西涯先生擬古樂府注》、乾隆32年長沙刻本《擬古樂府注》等主要刻本。明刊本除魏椿刻本以外，尚有陳以忠校梓本，現藏日本內閣文庫。

⁹ 《今樂府》100首具備本紀之權輿、年表世家之本、禮樂郊祀書、河渠書、邊防書、律書、賦役食貨書、刑書的體例，依開國臣之初、遜國臣之烈、靖難臣之遇、忠世名臣之盛、殉國諸臣之忠的順序編排，具備傳的體例，涵蓋訓宗室、箴外戚、覈儒林、責宰相、譏佞幸、重直臣、刺將帥、戒宦官、壯游俠、廣列女、痛朋黨、惡方技、警四夷等內容。詳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古學彙刊》（1912年2月刊竣，上海國粹學報社印行）。

¹⁰ 入矢義高：〈賴山陽〉，收入中村幸彥編：《近世の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6）。李東陽的《擬古樂府》在日本又有1858年的遊馬哈社藏梓本。雖寫有「何孟春音注」，不過並未添加音注。今有內閣文庫舊藏本。

為非忠貞之人。

錢謙益編《列朝詩集》，倡大一統之名分，更將朝鮮漢詩置於明詩史中。朝鮮文人視錢謙益如文天祥、謝枋得，喜讀錢謙益文集，贊同其反復古的主張。金昌協於《雜識·外篇》中盛讚錢謙益的碑文，師事金昌協的李宜顯則在《雲陽漫錄》中介紹錢謙益的反復古說，十八世紀的丁範祖編有《虞山文抄》。惟《列朝詩集》中的人物考據多有誤謬，李德懋在《薑山筆彙》已提出辨證。

至十八世紀末，朝鮮知識分子開始批判錢謙益。李用休在〈記錢牧齋事六則〉中，陳述錢謙益於《列朝詩集》高度評價阿好朋比者，如程嘉燧、李流芳、王志堅等人的事實（同《明詩綜》論點），以及蒐羅「輕俊浮薄湯顯祖輩」等論點，藉以攻擊王世貞的事實。並批評錢謙益原稱清人為「奴」，晚年竟於王永吉、王鐸的墓誌中稱皇清，反不如其門生瞿稼軒及姬妾柳氏的殺身解難。

對錢謙益的評價反轉之際，朴趾源對錢謙益的批判亦同時出現。

朴趾源於熱河居所寫下的〈避暑錄〉（朴榮喆本《燕巖集·熱河日記》，卷14），以及於北京居所寫下的〈銅蘭涉筆〉（《熱河日記》，卷15）二文中，有批判錢謙益〈跋皇華集〉、〈跋高麗板柳文〉的段落。朴趾源對於錢謙益於〈跋皇華集〉¹¹中對朝鮮文學的嚴苛批評，尤其感到憤慨。¹²錢謙益讀1539年明代詔使華察與朝鮮館伴的唱和集《己亥皇華集》（1539年刊行，後收於1608年木活字本《皇華集》總集中）後，認為明代詞林諸公貶調以和朝鮮淺陋的詩文，並批判朝鮮文人妄稱「每二字含七字意」體為「東坡體」。華察以翰林院修撰奉使入朝鮮，返國復命後遷詹事府，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之刊輯¹³。朴趾源對此反駁，稱朝鮮朝廷已選拔詞學之士為從事官，為預防明使臣為難朝鮮官員，平時亦勤於練習「每二字含七字意」體等詩文體。錢謙益認為「國內無戈坐一人」一句為「陪臣」所作，朴趾源則認為「國內無戈坐一人」一句乃朝鮮金安國所作。然而「國內無戈坐一人」為〈是日頒詔作東坡體一絕〉之起句，作者為華察。換言之，錢謙益與朴趾源皆未正確掌握《己亥皇華集》的體裁。又華察所謂「東坡體」，是指《東坡問答錄》與《回文類聚》中的「神智體」，1537年明代使臣龔用卿、吳希孟已向朝鮮遠接使鄭士龍提及。

¹¹ 「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此則嘉靖十八年己亥，上皇天上帝泰號、皇祖聖考聖號，錫山華修撰察頌詔播諭而作也。東國文體平行，詞林諸公不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者，乃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酬和可也。」

¹² 沈慶昊：〈燕岩論錢謙益〉，《中韓人文科學研究》第2輯（首爾：中韓人文科學研究會，1997），頁221-229。

¹³ 華察出身常州府無錫縣，與出身蘇州府常熟縣的錢謙益地緣接近，又與拔擢李攀龍的古文家王慎中同年，任職於禮部時，曾與王慎中及古文家唐順之等人講習。

(三) 對袁宏道的接受與侷限

正祖於 1791 年（正祖 15 年）的抄啓文臣親試及洋儒應製中策問〈俗學〉，批判包含陽明左右派與毛奇齡在內的偽經害經之流的「豐坊孫鑛之派」、過度偏重考證學的「楊慎季本之派」、善蟲刻雞距的操觚家的「七子五子之派」等三大派，並就此聽取諸生的意見。七子五子之派即李贄（《大雅堂集》）、虞淳熙（《德園集》）、徐渭（《文長集》）、三袁（《白蘇集》、《袁中郎集》、《珂雪集》）、鍾惺（《伯敬集》）、譚元春（《友夏集》）、文翔鳳（《太青集》）、李紱（《穆堂稿》）、毛先舒（《四古堂集》）、沈德潛（《歸愚集》）等。

然正祖所批判的明末清初之著作，皆於朝鮮受到廣泛閱讀。其中袁宗道（字伯修，著《伯修齋類稿》）、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著《袁中郎全集》）、袁中道（字小修，著《軻雪齋文集》）等公安三袁，對朝鮮漢文學的影響尤其深遠。袁宏道於〈識張幼于箴銘後〉中，提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追求「各任其性」的「真人」境界。朝鮮李用休為閭巷文人李彥瑱的文集撰寫〈松穆館集序〉，主張「從己起見」，又於〈題賞春詩軸〉中評閭巷文人金灑、李聖中、鄭喆祚、李亶佃等人，真正達到「玄思奇語」與「白意玄悟」。

1、朝鮮民族文學意識的成長與袁宏道文學觀的影響

朝鮮後期漢文學為積極追求民族文學的特性，曾參考 1597 年袁宏道於儀徵寄給江盈科的書信中，提及尊重今日之事與今日之文的理論。丁若鏞於 1832 年所作〈老人一快事六首【效香山體】〉第 5 首中，呼告「我是朝鮮人，甘作朝鮮詩」¹⁴。朴趾源於〈嬰處稿序〉中主張「朝鮮之風」的價值，於〈楚亭集序〉中主張法古創新，並於〈嬰處稿序〉中提出「字其方言，韻其民謠，自然成章，真機發現」，闡揚民謠的價值。上述幾個主張，皆被認為與袁宏道的文學論有著深刻關聯。

2、朝鮮後期對文學真情的重視與對袁宏道文學的參照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脫離復古主義文學，轉而重視性情之真，此時曾參考袁宏道的諸多文學主張。在此之前，許筠（1569~1618）雖早已提出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表達自然情

¹⁴ 沈慶昊：〈丁若鏞의 詩樣式 選擇（丁若鏞的詩樣式選擇）〉，《韓國漢詩의 理解（韓國漢詩的理解）》（首爾：太學社，2000）。（編按：頁碼不詳。）

感的主張，然而當時詩人僅止於以豔情詩表現女性情感。直至十八世紀，李用休始於〈我菴記〉（《惠寰雜著》）中，力陳將自我從經與天理中解放的思想。在重視自我的思想中，李用休於創作上主張「離古為神」論，排斥模擬，強調真情。他為閩巷文人李彥瑱的文集撰寫〈松穆館集序〉，主張「從己起見」，發現李彥瑱及金瀟、李聖中、鄭喆祚、李亶佃等人，達到「玄思奇語」與「白意玄悟」的價值。李鈺（1760~1813）受馮夢龍《情史》的影響，在〈俚諺〉的「二難」中重視真情的生動性。金鑣（1766~1821）在1801年寫下的〈思牖樂府〉自序中，對「思」的翻轉有所省察。

3、朝鮮後期漢文敘事領域的擴大與袁宏道的文學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在傳與墓誌銘的文學形式中，將記錄對象擴大至底層，並突出人物的形象化，此時袁宏道等人以人類缺陷為對象，細膩描寫其性格與志趣的作品，遂為朝鮮知識分子所參考。朝鮮文人李家煥（1742~1801）在為盧兢（1738~1790）所作的墓誌銘中，引用袁宏道的〈徐文長傳〉，對當時人才不受重用的固陋風氣抒發鬱憤。又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從市井小民的生命中，抽取其展現君子風範的面貌，與當時兩班官僚或道學歌的虛偽態度作為對比，藉以諷刺後者。李鈺在《文無子文鈔》的〈尙娘傳〉和《梅花外史》的〈車崔二義士傳〉、〈文廟二義僕傳〉，以及《桃花流水館小稿》的〈峽孝婦傳〉等文中，刻劃庶民展現忠孝烈的事實，即為代表。

此外，在袁宏道的遊記中，有不少篇章描寫自然的生命力，並於其中提出謳歌自然的人間理想。對此，朝鮮庶孽詩人李鳳煥於《兩念齋詩文鈔》卷10「讀書筭記」中，高度評價袁宏道的山水遊記為靈心的展現。朝鮮後期所作的園記，與袁宏道〈園亭紀略〉、袁中道〈杜園記〉、〈石首城內山園記〉等的敘述方式、描寫方法，有相當的關聯。三袁的尺牘亦影響朝鮮後期知識分子的創作生活。無論是袁宏道言簡意賅地談論文學論與創作思想的方式，或以短文吐露對時事、個人、日常生活、風俗世態之所見的方式，皆與朝鮮後期的新文學實踐頗為一致。

4、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對虛幻的批判及與袁宏道奇文的關係

十八世紀中葉後，部分知識分子不再認為性理學的理為不證自明的實存，認同其對經驗世界的認識有一定侷限。李用休於〈偶記〉（《歎數集》）中慨歎流言橫行，直言可合理說明現實世界的理念或參照依據已然解體的情況。在民間追求虛幻與迷信橫行之際，知識

分子目睹眾人沉醉於虛幻世界的現狀，必須對此提出因應的方案。¹⁵因此，朝鮮後期散文開始探討虛幻的問題，而這正與《袁中郎集》卷 10 所收〈紀夢〉、〈紀怪〉、〈紀異〉及〈與方子論淨土〉等神秘主義有關。

5、朝鮮的思想風土及與李贄、袁宏道間的距離

王陽明的學說受禪宗影響，袁宏道亦喜談禪，以變喻禪，於生活中實踐禪，更撰有《珊瑚林》一書。李鈺的〈烟經〉似由袁宏道的禪問答中變化而來。然而朝鮮知識分子為避免異端的嫌疑，特意與袁宏道的佛教說保持相當距離。又李德懋雖於〈士小節〉「性行」條中正面提及欲望的本體，一方面也擔憂將欲望視為真情的理論，恐導致無節制地表現欲望；《清脾錄》中雖多處引用袁宏道詩，肯定其詩的創新，卻也警惕對情的追求。李用休與袁宏道文學的關係，雖較同時代其他文人為深，不過除了公安派的文學思想外，他也重視錢謙益的文學思想。因此，李用休雖主張「離古為神」論，亦接受過去美學的價值，認為最終應走向「格古」與「意圓」的美學性。

朝鮮後期許多居於首爾地區的文人，曾於幼時接受明末小品體的影響，日後轉為批判明末小品體非「冠冕佩玉之文」。如李相瓚曾遭正祖批判一時傾向小品體，後於 1788 年（正祖 12 年）作〈詰稗〉6 條與〈斥稗詩〉30 首，寄託「訟既往之愆，尤懼流害之汨亂」之意。在〈詰稗〉第 6 條中，指謫應實踐「文章華國」與「文章經國」之理念的士大夫文人，作孤臣孽子「漂流轉泊之態」，乃背離實情之虛偽。

然而公安派（尤其是袁宏道文學）除了影響朝鮮文學，對朝鮮的思維方式亦影響深遠，此乃不容否認的事實。例如在朴趾源《熱河日記》的〈一夜九渡河記〉中，多次質疑人類的聽覺與視覺並非通力合作，以提供對現實世界更清晰的理解資訊，而是相互矛盾、欺瞞的事實。此篇文章與袁宏道於 1609 年所作的〈華山記〉（《袁宏道集箋校》第 51 卷，《華嵩遊草》2）中，描寫「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著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匡，目乃為崇，眩于削為栗，眩于深為掉，眩于仄為喘。」似有極大的關聯。朴趾源又於《熱河日記》〈黃教問答〉中，轉載與蒙古學者破老回回圖（字孚齋，號華亭）的對話中，聽聞而來的關異端論批判之說，此說與袁宏道〈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提出的思想極為類似。袁宏道認為，若欲彰顯儒學，孟子的「歸斯受」與「反經」較為穩當，不可如韓愈標榜「衛吾道」。¹⁶

¹⁵ 沈慶昊：〈朝鮮後期 散文에 나타난 虛幻 斗 實在의 問題（朝鮮後期散文中虛幻與實在的問題）〉，《漢文 散文의 內面風景（漢文散文的內面風景）》（首爾：昭明出版社，2001 初版，2002 修正增補）。（編按：頁碼不詳。）

¹⁶ 沈慶昊，〈朝鮮（李朝）後期漢文學の一特徴：袁宏道の理解を中心に（朝鮮（李朝）後期漢文學的

(四) 對清代文學的批判與接受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偏好描寫市井生活與人類個性的新文體，如《虞初新志》所收散文，並崇尚與格調說抗衡的神韻說之詩風。

《虞初》原是匯集唐人軼事之書，湯顯祖稱之為小說家之珍珠船，點校以傳世。湯顯祖續收唐以後調笑、滑稽、離奇、詭異之事，編為 12 卷。其後，張潮為編《虞初後志》，乃蒐羅明末清初人士以奇態、奇情為素材寫下的篇章，先以木版印刷《虞初新志》。¹⁷十八世紀朝鮮的金鏞與金祖淳喜讀稗史小品類，遂欲仿《虞初新志》體裁編成《虞初續志》，廣為蒐羅「外史」。《虞初新志》採集大量記錄「一切荒誕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的當代散文，其編輯態度與朝鮮後期野談集或漢文短篇集頗為類似。

此外，尤侗《外國竹枝詞》（1685 年刊行）對朝鮮後期竹枝詞作品帶來一定的影響，趙秀三的《外夷竹枝詞》（收於《秋齋集》）即為一例。尤侗的《皇明樂府》（1685 年木版本《外國竹枝詞》收「擬明史樂府」）100 首也影響了連作單形詠史詩的出現，十九世紀中葉朴珪壽的《鳳韶餘響絕句一百首》即為一例。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王士禎（自號漁洋山人）的神韻說大大影響朝鮮的詩創作與詩批評。以王士禎的例句為中心，則神韻代表㉑追求平靜的心理狀態；㉒詩的外在範圍寬廣幽遠；㉓物象的印象分明而渺茫；㉔歌詠春秋夜晚時光；㉕以程度低者為貴；㉖以清遠的詩風為主；㉗不拘於物像與心思。¹⁸朝鮮南公轍於〈與李元履（顯綏）〉其四（《金陵集》）中，曾表明自身對明代復古派的「模仿」與經國文章的理念感到厭倦之際，接觸到王士禎的詩論與詩，因而傾向神韻說。

然而王士禎的神韻說與逃避現實的精神態度，有著緊密的關聯。朝鮮後期的知識分子，無法完全自外於憂患意識。丁若鏞稱「焉能飾悽愴，辛苦斷腸為？」批判王士禎的神韻為矯飾的哀傷。

不過丁若鏞於 1808 年夏天所作的〈又示二子家誠〉（《與猶堂全書》，第 1 集，第 18 卷）中，曾提出七言古詩具有一定形式要件的事實：

一個特徵——以宏宏道的理解為中心），《アジアのなかの韓國傳統文化：朝鮮朝の知（亞洲中的韓國傳統文化：朝鮮朝の知）》（九州：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センター，2003 年度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センターシンポジウム（2003 年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論壇），2003 年 11 月 30 日），頁 29-60。

¹⁷ 張潮輯：《虞初新志》（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點校本）；鄧長風：〈虞初新志的版刻與張潮的生平〉，《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¹⁸ 鈴木虎雄：〈神韻說之特徵〉，《中國詩論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中譯本。）（編按：頁碼不詳。）

- ①平入上去必要錯雜押去，以平承平，以入承入者，絕無也。（轉韻七言古詩元和體）
- ②若韻腳既平，即對眼必用仄聲。以平對平者，無有也。
- ③又如長安古意，字字叶律，每四句，各為一章，如絕句然。茲所謂連環律法也，（連環律法 七言古詩）
- ④若通篇只用一韻字，無此律法。（一韻到底 七言古詩）

丁若鏞的七言古詩平仄論批判王士禎《王文簡古詩平仄論》（收於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與其甥婿趙執信的《聲調譜》，在長篇七言古詩的平韻到底與仄韻到底形式中，對出句與對句（落句）的平仄要求過於煩雜，並提出與此相異的歸納理論。此外，洪奭周在《鶴岡散筆》中，對於王士禎與趙執信的古詩平仄論，也提出使詩侷限於聲律而削減言志功能的批判。

三、朝鮮知識風土的變化與明清學術

（一）對清代學術的接受

朝鮮學者無法認同明清學者對朱子的批判與嚴厲指責。尤其自朝鮮前期，世宗於內外頒布明代永樂皇帝勅撰之《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以來，該書已成為朝鮮儒學的基本教科書。正如顧炎武於《日知錄》卷 18〈四書五經大全〉中的批評，《四書五經大全》其實多沿襲自既有的書籍。¹⁹或許是深知此一事實，世宗亦曾將明代金珙（仁本）於 1434 年（宣德 9 年）合《重訂四書輯釋》、金履祥的《疏義》與《指義》、朱公遷的《通旨》與《約說》、程復心的《章圖》、史伯璿的《管窺》、王元善的《通攷》等書，所編成之《四書通義》（《重訂四書輯釋通義大成》），以甲寅字印頒（日本蓬左文庫藏）。然而《四書大

¹⁹ 據顧炎武主張，《四書大全》為元代倪士毅再次引用以胡炳文《四書通》與陳櫟《四書發明》為底本編成的《四書輯釋》（《重編四書發明》或《四書輯釋大成》），有不少錯誤；《春秋大全》承襲汪克寬《胡傳纂疏》，僅添加元代李廉的一二條目；《詩經大全》承襲元代劉瑾的《詩傳通釋》。

全》頒行以後，《四書通義》逐漸為人淡忘。

朝鮮後期李瀾（1681~1763）於其《星湖僊說》第18卷經史門「程復心」項中，明確指出《四書章圖》對韓國儒學的影響，並言及1569年（宣祖2年）6月20日的夕講中，尹根壽以為退溪李滉〈心學圖〉與《四書章圖》深有關聯。然此言為奇大升之說，非尹根壽，為誤記。儘管如此，李瀾仍考察了《四書章圖》對李滉的影響，高度評價《四書章圖》之精微。

直至朝鮮後期，時居太子宮春邸的正祖，於1772年（英祖48年）重刻該書，²⁰並於在位23年的1799年冬，發現舊時賓客徐命膺家中收藏的原書，遂令重訂與校勘該書，然最終並未刊行。又正祖於1796年參考關於《左傳》的諸多說法，彙集與刪削注釋，親自且獨立編成《春秋左氏傳》28卷，並於隔年秋天以丁酉字刊行，後命嶺南與湖南監營整版。

在朝鮮後期經學研究上，最普遍使用的文本批評方式，為對「義理」的關照。即宋代歐陽脩著述〈泰誓論〉時，以符合「人情」與否作為理論準據的「合理」方法。不過到了朝鮮後期，知識分子部分接受漢學，一面圖謀漢宋折中，在經典解釋上，逐漸應用文字學知識進行訓詁作業。在清代雅學傳入朝鮮前，李匡詩等人曾獨立嘗試解釋字義的訓詁學，丁若鏞則使用結合「合理」論與本文參校的方式。此方法與戴段二王之學的音韻學、文字學頗有距離，又與嘉定錢氏之學不同，對名器論、義理論的關注大於對歷史事實的考證。

朝鮮後期的詩經學重視小序，在補訂《詩集傳》之說時，多參考明清的從序說。康熙命以《詩集傳》為綱，將古義中不可廢者編為附錄，於1727年（雍正5年）以《欽定詩經傳說彙纂》20卷刊行。朱熹的鄭風淫詩說在此遭到批判。直至乾隆年間（1755年）完成的《欽定詩義折中》20卷，方以鄭玄之說為詩篇分章，據小序解說微事等，朱熹之說正式獲得修正。

朝鮮利用《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的紀錄，首見於徐有榘答正祖辛亥條問的條對。徐有榘在就刊登《四書輯釋》一事寄給仲父徐溎修的〈上仲父明臯先生論四書輯釋書〉（《楓石全集》收《鼓篋集》，卷3）中，表達應參考欽纂本編《十三經傳說》的意見。他建議：《易》應利用《折中》；《詩》、《書》、《春秋》應利用《彙纂》；三禮應利用《義疏》（欽定本）加以修正；《孝經》、《爾雅》依相同方式；《大學》、《中庸》依《禮記》還原；《左傳》、《穀梁》、《公羊》各自出版，並各以《註疏》為前編，以《傳說》為後編，兼收諸儒之筭解。

²⁰ 《新訂字數》（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內有〈重鑄四書輯釋鈔〉一文。正祖以朝廷內藏之倭刻《通義大成》，即1671年（寬文11年）刊行之《重訂四書輯釋章圖通義大成》為底本，刪去〈約說〉、〈章圖〉、〈通攷〉、〈通義〉等後人添加的篇章，僅取倪氏舊本繕寫對校，每上奏一篇，即親自勘訂。

(二) 對毛奇齡學說的批判性接受

清初浙東學派的毛奇齡（1623~1713），被朝鮮後期文人、學者視為標新立異的人物，多有嚴厲的批判。不過他在經學史上留下許多影響至深的業績，如論證明代出現之《子夏詩傳》與《申培詩說》為偽作，正祖在詩經講義條問中採用此說。毛奇齡反對《明史》置入〈道學傳〉，作〈辨聖學非道學〉與〈王文成本傳〉，並留下攻擊朱熹四書學的《四書索引》、《論語稽求篇》、《大學證文》、《大學知本圖說》、《中庸說》、《四書臆言》、《四書臆言補》、《聖門釋非錄》等書，八十六歲時將上述著作要旨編為《四書改錯》，欲進獻康熙皇帝。

朝鮮後期的正祖為擁護朱子學，積極防範毛奇齡經學說的散布。十九世紀初，洪奭周與金邁淳等老論派的京華學人重視義理之學的傳統，對毛奇齡以降的考證傾向頗為反感。然而在十八世紀末，李德懋雖譴責毛奇齡批判程朱學，卻也在真偽論的觀點上採用毛奇齡的經學說。朴趾源也在《熱河日記》中，表達部分認同毛奇齡詩經說的看法。

對於經學研究方法，毛奇齡提出「說經勿杜撰」、「勿武斷」、「勿誤作解說」、「勿誤章句」、「勿誤訛人倫序」、「勿因經誤以誤經」、「勿自誤誤經」、「勿因人之誤以誤經」、「勿改經以誤經」、「勿誣經」、「勿借經」、「勿自造經」、「勿以誤解經之故而復回護以害經」、「勿依違附經」、「勿自執一理以繩經」、「勿說一經碍一經」等要領，而此方法影響部分朝鮮知識分子極大。²¹丁若鏞儘管批評毛奇齡作〈曼殊藏銘〉、〈曼殊別誌書磚〉與〈擬連廂詞〉，於〈跋曼殊傳〉（《與猶堂全書》，第1集，第14卷）中嚴厲批判「妄攻朱子，不免為蚍蜉之撼樹」，然而在深化自身經學思想的過程中，卻也對毛奇齡的學說有了批判性的接受。

1、丁若鏞批判毛奇齡的易學，作〈題毛大可子母易卦圖說〉。丁若鏞概括《左傳》的卦解與虞翻易學，重新解釋推易、物象、互體、爻變的法則，並運用十二辟卦說。同時，丁若鏞亦批判毛奇齡的子母易卦說，斥責毛奇齡不識推移與爻變之法。然而在丁若鏞的易學說中，不難見出受毛奇齡易學克服宋易之面貌。

2、丁若鏞認為梅賾本古文尚書為偽作，批判毛奇齡的《古文尚書冤詞》。他於1827年閱讀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後，統一義例，編成《閻氏古文尚書疏證鈔》，又於1834年將自身著作《古訓蒐略》與《尚書知遠錄》合編為《尚書古訓》。然而丁若鏞於區分書序的完缺與真偽、推定原義時，所援用之體例研究法，應是參考毛奇齡及清朝學者的文獻實證學。

²¹ 沈慶昊：〈朝鮮後期 學問研究方法論의 分化와 毛奇齡 批判（朝鮮後期學問研究方法論의 分化與對毛奇齡的批判）〉，《東洋學》第29輯（首爾：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99），頁37-69。

3、丁若鏞於〈題毛奇齡喪禮吾說篇〉中，反駁毛奇齡認為《周禮》出現於戰國時代的說法，主張從文體觀之，《周禮》乃春秋以前之作。對於《禮記》的成書，也否定毛奇齡的漢初成立說，主張為子游、子夏門人公羊、穀梁等人對傳聞的紀錄。相較於毛奇齡徹底懷疑既有的學說，丁若鏞則是保持尚古與衛道的態度，將《周禮》視為周公之作，並將《禮記》視為先秦時代的書籍。

4、丁若鏞攜毛奇齡《聖論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等書至流放地，審閱其內容。丁若鏞批判毛奇齡的樂論體例未備，自撰《樂書孤存》，區別五聲體系的五聲九差圖與十二律體系的三紀六平（紀之以三，平之以六）。

5、丁若鏞作《論語古今註》，舉日本太宰純《論語古訓外傳》與毛奇齡論語說為例，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又於《孟子要義》中引用諸位清朝學者的學說，其中引用毛奇齡的學說最多。丁若鏞雖在《大學要義》中多處反駁毛奇齡的學說，然而相信古本大學存在的立場與毛奇齡相同，《中庸自箴》也多引用毛奇齡的學說。

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大致尊重義理之學與經世學，將考證視為名物訓詁的煩雜學問。而在經學上嘗試漢宋折中的知識分子，則相當程度接受毛奇齡的經學說為分析方法。

（三）對顧炎武著作的接受

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概論》中稱王學末流陷於空疎弊端之際，考證學作為反動的力量興起，其中被稱為此一學問始祖的人物，即為顧炎武（1613~1682）。顧炎武結合經世學與文獻考證法的研究方法，對朝鮮後期學者帶來極大影響。《日知錄》於顧炎武生前（1670年）以8卷本刊行，顧炎武死後，由潘耒於1695年（康熙34年）以32卷本出版。李德懋（1741~1793）於〈與李洛瑞書九書〉（《雅亭遺稿》，卷6）中，稱其苦求3年而得《日知錄》，讀後對該書考證之卓越讚嘆不已。32卷本《日知錄》似乎曾傳入朝鮮。韓致奭（1765~1814）也在《海東繹史》的「引用書目」提及《日知錄》。李圭景（1788~?）於《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所收諸篇辨證說中，多次利用《日知錄》。其中〈稱號古今不同辨證說〉一文，李圭景引用《日知錄》說明「先輩」、「進士」的名稱，考證「進士」之稱呼在中國朝鮮各不相同。藉由文獻集成，讀出稱呼的「習俗變遷」，這點與顧炎武的論述頗為類似。

1、地理考證與歷史論中對《日知錄》的引用

朴趾源在《熱河日記》〈忘羊錄〉的主張，使人聯想至中國學者王民皞據《日知錄》，

證明馮熙《古書世本》中所言箕子朝鮮本古文尚書，為引用王惲《中堂事記》的偽撰。韓致齋在撰寫《海東歷史》，考證三韓、貊、朝鮮、四郡時，亦引用《日知錄》。李裕元(1814~1888)也在《林下筆記》卷11的「文獻指掌編」中，於撰寫「三韓」條與「毛延壽」條時，大量引用《日知錄》。

徐浩修(1736~1799)在《燕行紀》1790年9月5日(壬午)的紀錄中，考證三河縣西夏店時，引用《日知錄》提出與舊夏澤有關的主張。在1803年完成的《薊山紀程》(作者不詳)12月10日(辛未)「翠雲屏」條中，提及詩作被刻在北鎮廟松樹上的金鼎時，引用《日知錄》表示遼東人曾自稱三韓的可能性。

2、關異端論與經學論中對《日知錄》的引用

星湖學派右派的安鼎福(1712~1791)，於1785年撰成批判天主學的文章，並引用顧炎武《日知錄》以為立論之根據。²²又安鼎福於《經書疑義》(《順菴先生文集》，卷11)中，全部引用《日知錄》《四書五經大全》的內容，批判朝鮮過度重視《四書五經大全》小註並不正確。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也批判《四書五經大全》，一方面認同顧炎武的《日知錄》。

3、經世論中對顧炎武的引用

丁若鏞於《經世遺表》中論井田法，指鄭眾與鄭玄雖通訓詁，卻不甚了解制度，贊同顧炎武《郡縣論》中將封建法應用於郡縣制度的說法。又丁若鏞於《跋顧亭林生員論》中認同顧炎武的《生員論》，²³批判兩班只是未經科舉文科、武科選拔的虛名，禁錮一生身分的淵藪；丁若鏞於《牧民心書》中提出嚴格實施地方官評鑑的方案，其理論與顧炎武於《日知錄》卷8《選補》中，主張人才登用應並行科舉與科舉以外的薦舉制度，嚴格執行地方官吏的選拔與評鑑，有著一定的關聯。

²² 「清儒顧炎武《日知錄》曰：『大秦國始見於《後漢書·西域傳》：「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國通。」今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又曰：『唐玄宗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獻解天文人大慕闌，問無不知。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不許。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玄宗之世，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按此言，亦以天主說為非矣。」安鼎福：《天學考 乙巳》，《順菴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30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卷17，雜著。(編按：頁碼不詳。)

²³ 顧炎武：《生員論》3篇，《亭林詩文集》，文集，卷1。在《日知錄》卷16、卷17、卷18與科舉相關的條目中，感慨生員或進士應被視為資格概念，而現實卻視之為保障一生官職的身分概念。

4、對顧炎武韻學的理解

朝鮮時代知識分子多獨立鑽研韻學，然而並未發展漢字上古音體系的研究或分析音韻變化的學問，因此未見鑽研顧炎武韻學的事例。金正喜（1786~1856）於〈代權彝齋敦仁與汪孟慈喜孫〉（《阮堂全集》，卷 5）中，雖曾提及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的上古音研究內容，不過未再深入探討顧炎武 10 部分類、江永 13 部分類、段玉裁 17 部分類之間的差異。²⁴

顧炎武主張學術上應經學、史學並進，而該主張對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應有一定的影響。顧炎武曾於《日知錄》卷 16〈史學〉中，慨歎明末史學嚴重廢絕，主張如唐代將「三史」與「三傳」立為科舉科目，將可招徠精通治國政事的儒生。²⁵朝鮮後期李瀾與金萬重雖經學、史學並進，卻未表現出與顧炎武的關聯。儘管如此，仍可推測十八世紀後半知識分子對顧炎武學問論的認同。

丁若鏞雖參考顧炎武最多，對顧炎武的學術方法亦有所批判。²⁶丁若鏞批判顧炎武《日知錄》的原因有二。第一，取史傳語與己之立論相雜，不成義例；第二，高談闊論之目的，似在保全其名聲。上述兩個原因，應與《四庫提要》評論《日知錄》的內容相互參看。《四庫提要》評《日知錄》有經世濟民之意，考據精詳，然激於時事，以復古為志，不免迂遠過激。比較這則有所保留的評論，丁若鏞的指摘亦不失為中肯之見。清代洪亮吉與朱彝尊皆曾批判顧炎武考證。日後李圭景雖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亭林被駁辨證說〉中為顧炎武辯護，然而朝鮮知識分子已知顧炎武的「糾譌正誤之學」並非毫無誤謬。

四、朝鮮後期小學、名物度數學與明清學術

²⁴ 江永之說收錄於《古韻標準》，與顧炎武的 10 部說相比，顧炎武的第 4 部「真」（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各韻）分為「真」與「元」兩部。顧炎武將[-n]韻尾全歸於第 4 部，而江永導入內轉、外轉的構想，將第 4 部（內轉）分類為真、諄、臻、文、殷、魂、痕、先，將第 5 部（外轉）分類為元、寒、桓、刪、山、先、仙（分屬「先」韻母的兩側）。

²⁵ 朱熹主張科舉應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為一科目，以《三國志》、《晉書》、《南史》、《北史》為一科目，以《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為一科目，此外以詩賦、律曆、地理為其他科目。該主張與朱熹的脈絡相同。

²⁶ 「《日知錄》其學術議論，卻未能十分愜意。蓋其本領，務要作高談正論[非真箇正論，人謂之正論者]，以全其名，未見有惻怛真切之心。其所為憂時慨世者，都有鬆雜不清淨意思，著在言談之外，如吾直性男子，有時乎為之注目耳。又其鈔取史傳中語，與己所立論者，相雜成書，大是冗雜。吾嘗謂《星湖僊說》，未足為傳後之正本者，以其古人成文，與自家議論，相雜成書，不成義例也。今《日知錄》正亦如此，且其禮論，殊多謬戾耳。」丁若鏞：〈寄二兒〉，《與猶堂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81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第 1 集，詩文集，第 21 卷，頁 451。

(一) 小學概念的再定位

正祖除了欲確立文字的正字體，亦有志於樹立論漢字字形與構造的說文學，《日得錄》中保留了正祖當時的構想。²⁷另一方面，正祖曾命徐命膺等人編《奎章韻瑞》，命李德懋等人編《奎章全韻》。此二書雖為韻書，亦有提示標準字形的意圖。根據《正祖實錄》，正祖於 1796 年（正祖 20 年）頒布《奎章全韻》，令使用科場入聲，亦提及書籍中使用文字時的御諱問題，命文字使用依《奎章全韻》為準。²⁸正祖於 1792 年 8 月《奎章全韻》草稿完成後，命閣臣尹行恁、徐榮輔、南公轍與承旨李書九、李家煥、校書校理成大中、檢書官柳得恭、朴齊家校正，並下頒〈文字策〉，命上述人員撰作對策文。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李書九、尹行恁等人的對策，皆分別收於個人文集中。當時正祖下頒的〈文字策〉（《弘齋全書》，卷 51，策問 4，文字）中，除要求對文與字的概念、六書的定義、字體的變遷說明外，亦要求對小學定義。毛奇齡早在《大學證文》、《四書臆言》等著作中引經據典，批判「小學」原是字學，朱子妄稱灑掃應待之節的教本為「小學」，而正祖要求文臣對此提出反對的論點。當時撰寫對策的臣子，主張修身教科與字學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後李圭景亦作〈小學古今辨證說〉（《分類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 51），反對教導修身學的《小學》流行後，作為字學的小學隨即衰退的說法，認為作為字學的小學至為重要，兩者殊途同歸。

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欲參考清代考證學，樹立自身說文學的趨勢。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1815）傳入朝鮮的可能性極大。惟論字學時提及段注的人物，只有金正喜、許傳、張之琬、李裕元、朴珪壽、李圭景等少數幾人。根據鄭寅普的〈六書尋源敘〉，朝鮮的說文學著作僅南正和的《說文新義》與朴瑄壽的《說文解字翼徵》。《說文新義》今失傳，《說

²⁷ 「許氏《說文》，自徐鍇《五音韻譜》行而始一終亥真本，遂失其傳。始徐鍇之撰《韻譜》，專為後學檢字而作，故其兄徐鉉序，以為方今許李之書，僅行於世，偏旁奧密，不可意知。故舍弟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然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聊存訓詁，以為別識云云。無恤其他者，言體例與《說文》迥別也；聊存訓詁者，言不載舊註也。乃巽巖李燾不識此義，割裂《說文》，依韻重編，起東終甲，名曰《五音韻譜》，而猶以《說文》舊序冠之，其偽謬甚矣。近有汲古閣主人毛扆，新得宋槧始一終亥本，校刊廣布，流傳我國，而跋云鬻田而刻成之，其博雅好古，豈易多得哉？可使後世矇經吝財之士知所勸也。[檢校直提學臣徐浩修乙巳錄]」正祖：〈文學 1〉，《弘齋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67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卷 161，日得錄 1。（編按：頁碼不詳。）

²⁸ 「頒賜《御定奎章全韻》于中外。教曰：『我東韻書之彙以三韻，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而不押增韻與入聲，科場不押增補，亦不曉通韻、叶音之格，鹵莽莫甚。所以博據廣證，命編是書者也。此後公私押韻字及入聲，準此韻書義例、式令事，分付京外掌試之司。即予苦心，在於矯俗正習，是書之編，豈特專為諧音比聲？政欲一洗諂偽之陋。近年印本書冊，御諱之刪畫，所見甚駭然。屢勤飭教，不即復古，甚至諱稱字音，中間並諱之，因循而無非可以矯正之端。自今，似此習俗，一切嚴禁，韻書，今日為始行用。』」《正祖實錄》，正祖 20 年 8 月癸未。（編按：頁碼不詳。）

文解字翼徵》依《說文解字》體例列出鐘鼎文的金文，並以此為依據解說文字。雖與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體裁類似，卻是獨自的創發。

（二）對類書體例的參考

朝鮮知識分子多藉由類書查驗知識事項，亦親自將資料分門別類，編成個人的類書。韓國先是接受中國類書，並作為文獻用語辭典使用。根據現有紀錄，可知高麗時代自宋代傳入《冊府元龜》與《太平御覽》，並於 1151 年 6 月於精義堂校正《冊府元龜》。高麗恭愍王 13 年(1364)，明州司徒方國珍將《玉海》與《通志》帶入朝鮮；朝鮮太宗 3 年(1403)，獲得明代禮部贈與的《山堂考索》。現存韓國最早的類書，為朝鮮宣祖年間由權文海編纂的《大東韻府群玉》20 卷 20 冊。至十七世紀，李晬光編《芝峰類說》20 卷 10 冊，1644 年(仁祖 22 年)金堉編《類苑叢寶》47 卷 22 冊，1654 年(孝宗 5 年)吳命鰲編《古今說苑》10 卷 10 冊。《東國文獻備考》與《萬機要覽》出現後，《增補文獻備考》等國家主編的掌故類書籍接連出現。朝鮮時代系統地整理、分類文物制度事項與文翰用語的方式，最先是參考中國的類書，之後逐漸建立分類標準。而採用添加按說的「雜考」體例的類書，較採用「載文」體例的類書多。在此系列中，以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最為鴻篇巨秩。李圭景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的〈序文〉中，稱「名物度數之學」雖不及「性命義理之學」，但也不可視之如異端。

鄭道傳(1337~1398)於 1395 年編《經濟文鑑》時，曾參考《周禮訂義》、《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山堂考索》等書。²⁹1420 年(世宗 2 年)12 月國葬時，世宗命禮曹判書許稠參考《文獻通考》、《山堂考索》、《洪武禮制》，整理為祭祀義例。爾後《國朝五禮儀》開始編纂，於 1474 年完成，編纂過程中應大量參考《山堂考索》等類書。

陳元靚的《事林廣記》(《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歷經元、明的刪改增補，數度易名為《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重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等。在元刊本《事林廣記》中，漢蒙對譯語彙集以《至元譯語》或《蒙古譯語》之名收入，這影響了朝鮮《華夷譯語》的編纂。明刊本亦對朝鮮學術帶來不小的影響。

另一方面，1493 年(成宗 24 年)9 月癸丑字活字鑄造完成後，癸丑字與甲辰字一起使用於《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的印刷。明代時曾被稱為「事文類聚」，又與祝穆《新編古

²⁹ 都賢哲：《〈經濟文鑑〉의 引用典據는 鄭道傳의 政治思想 (從《經濟文鑑》의 引用典據看鄭道傳的政治思想)》，《歷史學報》165 (首爾：歷史學會，2003)，頁 69-102。

今事文類聚》不同的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即《翰墨全書》),在明代廣為流行,該書在朝鮮亦多被使用。《翰墨全書》計有3個系統7個版種,而於朝鮮初期傳入的版本,現於臺灣有2種,日本有5種。³⁰

明代彭大翼編《山堂肆考》(1595),為張維《谿谷漫筆》所引用,對朝鮮後期學界有一定的影響。高麗大學圖書館晚松文庫藏萬曆23年刊本零本5冊(全228卷,補遺12卷),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抄寫自萬曆四十七年增補本的抄本238卷本(缺角第10冊48卷、羽第10冊48卷)。³¹明代章潢的《圖書編》127卷(1562)、王圻的《三才圖會》80卷(1607)與謝肇淛的《五雜俎》,為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嗜讀之書。

1713年朝鮮使臣赴清,受贈《淵鑑類函》、《古文淵鑑》、《佩文韻府》;1720年李宜顯赴清購得《冊府元龜》、《圖書編》、《稗編》、《三才圖會》、《黃眉故事》、《白眉故事》等書。正祖欲求四庫全書而未能如願,最終購得康熙年間(1662~1722)陳夢雷等人編纂,並於1706年(康熙45年)完成之《古今圖書集成》。

正祖5年(1781)編纂的《奎章總目》中,收有中國本類書32種: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冊府元龜》、《事文類聚》、《事類賦》、《翰苑新書前集》、《稗史彙編》、《三才圖會》、《唐類函》、《明辨類函》、《稗編》、《右編》、《圖書編》、《問奇類林》、《鴻書》、《山堂肆考》、《彙苑詳註》、《時物典彙》、《百家類纂》、《天中記》、《涉世雄譚》、《經濟類編》、《皇明經濟文輯》、《皇明名臣經濟錄》、《八編類纂》、《廣博物志》、《圖書集成》、《淵鑑類函》、《駢字類編》、《廣事類賦》、《格致鏡原》

趙在三於1855年(1808~1866)編《松南雜識》14卷7冊,由33類4432條項目構成,其中大量引用中國的類書與叢書、韻府、雜考類書。引用書目如唐代《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宋代《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海錄碎事》、《事實類苑》、《玉海》、《錦繡萬花谷》、《古今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源流至論》、《事物紀原》、《孔氏六帖》,元代《韻府群玉》,明代《天中記》、《山堂肆考》、《廣博物志》,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子史精華》、《格致鏡原》、《古文淵鑑》

³⁰ 住吉朋彦:《〈翰墨全書〉版本考》,《斯道文庫論集》第42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2008.2),頁231-348;住吉朋彦:《中世日本漢學の基礎研究韻類編》(東京:汲古書院,2012)。(編按:頁碼不詳。)

³¹ 手抄本239卷50冊,返還文化財。序:萬曆乙未(1595)[……]彭大翼;跋:萬曆乙未(1615)孫壻張幼學。卷首有重訂山堂肆考、山堂肆考自序、跋山堂肆考、山堂肆考跋、小記、重訂山堂肆考,另附有山堂肆考補遺。本文與通行本的順序不同。

等書。《古今事文類聚》使用明代重刊本。

朝鮮類書在分類方式上，多有參照中國類書的情況。《藝文類聚》天地人物四部的分類方式，³²不僅是中國類書編纂的一項標準，朝鮮類書與雜考亦多依此方式：

《芝峯類說》天文部—時令部—災異部—地理部—諸國部—君道部—兵政部—官職部—儒道部—經書部—文字部—文章部—人物部—性行部—身形部—語言部—人事部—雜事部—技藝部—外道部—宮室部—服用部—食物部—卉木部—禽蟲部(25部)

《松南雜識》天文類—歲時類—地理類—國號類—歷年類—外國類—人事類—嫁娶類—喪祭類—姓名類—科舉類—文房類—武備類—農政類—漁獵類—室屋類—衣食類—財寶類—什物類—音樂類—技術類—拘忌類—仙佛類—祥異類—稽古類—理氣說—人物類—朝市類—方言類—花藥類—草木類—蟲獸類—魚鳥類(33部)

五、朝鮮江華學派與陽明學的關係

十八世紀末的朝鮮，作為正統教學的朱子學與政治權力掛勾，無法發揮現實救援的功能，部分少論系重視專內實己，逐漸形成江華學派。³³鄭寅普自1933年起於《東亞日報》連載《陽明學演論》，首度概述朝鮮陽明學派，³⁴而在《朝鮮古書解題》的〈愍書〉提要中，提到包含朝鮮陽明學派在內的朝鮮後期學風，已轉向求是求真的本路上。³⁵江華學派

³² 《藝文類聚》天部—歲時部—地部—州部—郡部—山部—水部—符命部—帝王部—后妓部—儲宮部—人部—禮部—樂部—職官部—封爵部—治政部—刑法部—雜文部—武部—軍器部—居處部—產業部—衣冠部—儀飾部—服飾部—舟車部—食物部—雜器物部—巧藝部—方術部—內典部—靈異部—火部—藥香草部—草部—寶玉部—百穀部—布帛部—果部—木部—鳥部—獸部—鱗介部—蟲豸部—祥瑞部—災異部(48部)

³³ 沈慶昊：《江華學派의 文學斗 思想(3)》(江華學派의 文學與思想 3)(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1995)；沈慶昊：《江華學의 虛假批判論(江華學的虛假批判論)》，《大東漢文學》14(慶山：大東漢文學會，2001.6)，頁37-78；沈慶昊：《江華學派의 假學批判(江華學派的假學批判)》，《陽明學》13(首爾：韓國陽明學會，2005.2)，頁245-292。

³⁴ 鄭寅普：《陽明學演論》，東亞日報1933年66回連載；鄭寅普著，洪以燮編：《陽明學演論》(首爾：三星文化財團，1972)；鄭寅普：《陽明學演論》，《蒼園鄭寅普全集》2(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

³⁵ 鄭寅普：《朝鮮古書解題》，《蒼園鄭寅普全集》1(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

自霞谷鄭齊斗以後建立學脈，³⁶雖非完全遭政界排斥，亦非政局的主導勢力，他們依韓國的現實情況解釋陽明心學，在訓民正音與歷史研究上取得許多成果。

李匡臣據獨知以分別誠、偽，使良知回到純善本然之性，這與明代劉宗周頗為類似。金澤秀於〈霞谷祭文〉直指本心，堪稱錢緒山、王龍溪之流亞。然而鄭寅普指出，鄭齊斗學姚江學（陽明學），乃為從中尋求「專內實己之學」的可能，而鄭齊斗於陽明學之外，亦精通天文與曆算。儘管自鄭齊斗後，朝鮮心學一脈因憂禍纏身而隱跡，其遺風仍興起重視朝鮮典故之學問。換言之，朝鮮陽明學系譜並非受限於陽明學的範圍內，而是發展出重視涵蓋天文、曆算在內的博學學風與典故的朝鮮學。一般而言，學（science）必須具備形式成熟、規模齊備的學問體系。由此觀之，江華學派的旁涉繁多且外延極廣。

被稱為朝鮮樸學之宗的申綽，除撰寫《老子旨略》外，亦運用文獻集成法整理《詩》、《書》、《易》的古訓，編成「三次故」（即《詩次故》、《書次故》、《易次故》），撰成《春秋左傳例》，對《儀禮》亦有研究。在經學上，申綽不追隨朱子之說，而是以「吾心」解釋經文。

李匡呂作〈老子五則〉（《李參奉集》，卷4），主張真實無偽論。³⁷李肯翊（1736~1806）著私撰史書《燃藜室記述》，排除個人史評以求不偏不黨。李忠翊將思維範圍擴大至佛教與老子，他的《椒園遺藁》中留下〈假說〉上下篇與〈君子之過說〉，在〈假說·上〉批判朱子正統主義與大義名分論，實為老論黨論的虛偽意識，在〈假說·下〉揭露學問權力的暴力壓迫。鄭東愈也批判俗學的假義理，於《晝永編》中表達對天文、地理、算數、醫藥、訓民正音、九流百家的關注。又《晝永編》收魏禧的〈續續朋黨論〉，警告即使是君子黨，也有陷入自私自利的危險。

現藏於李匡呂（1720~1783）後人家中的草稿本《李參奉集》六冊中，有寄給徐懋修（1716~1785）的簡札116封，在李匡呂於1760年寄給徐懋修的10封書札中，有「喜見釋典文字以自適」之語。1789年（正祖4年）夏日寄給徐懋修的書札第99封、第100封、第101封內，可見得回答徐懋修的詢問，並分析《老子》語句的內容。即第99封書札內分析「谷」，第100封書札內分析「長生久視」，第101封書札內分析「出生入死」。在第102封書札內，表明《老子》可矯正自我缺失，故喜讀《老子》。李匡呂認為《莊子》中多篇艱澀，不易理解，然深知「其人品極超遠，終為良潔之人」，闡明自己嗜讀《老子》與《莊子》的原因。

李匡呂族兄李匡師自幼喜好道家之說與佛氏之書，族兄清安公李匡度（1677~1746）亦喜《老子》與佛書。如前所述，李匡呂曾於《老子》作〈老子五則〉，主張真實無偽論。

³⁶ 中純夫：《朝鮮の陽明学——初期江華学派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

³⁷ 沈慶昊：〈恒齋李匡臣論〉，《震檀學報》84號（首爾：震檀學會，1997）。（編按：頁碼不詳。）

第四則與第五則提及《論語·公冶長》中微生高之事，批判他是非真正的正直，卻以正直偽裝的「掠美市恩」。他也同意《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認為無名實、真偽之分的狀態乃為「至善」。在第五則中，認為微生高之不直，非一己之不直，亦有害於全盤之正直。

從學李匡呂的李忠翊（1744~1816），與再從兄李令翊（1740~1780）論朱學、王學的差異與《尚書》的今古文問題。李令翊是鄭齊斗的孫女婿。李忠翊曾參與《真言集》的重刊，並對焦竑的《老子翼》提出己見，留下《椒園譚老》（延世大圖書館藏手抄本，上下1冊）。李忠翊推測《道德經》原文有後人竄入，然而未進行異本的對照或定本的確認。在《椒園譚老》的〈後序〉中，李忠翊稱「無生有」只論及「理論性的發生」，不認同根本論上的絕對無。

《椒園譚老》對同為江華學派的申綽（1760~1828）著作《老子旨略》，應有一定的影響。申綽批判〈河上章句〉多有怪異之處，明薛蕙的《老子集解》辭旨淺薄，並參考西溪朴世堂（1629~1703）的《新註道德經》與明代陳深的《諸子品節》所收老子注81章「其箋解不著姓氏，疑是深所自為者」。申綽深思老子各版本的字句差異，欲編纂《老子考異》。其於34歲的1792年（正祖16年，壬子）至隔年，完成《老子旨略》的編纂，並於1793年（正祖16年）3月甲子作〈老子旨略序〉。全書似於申綽死後，隨即亡佚。在〈老子旨略序〉一文中，申綽直指莊周放於論，楊朱厚於身，申不害、韓非子拘於名，王弼、何晏流於無，各失於任、劃、慘、誕，故不得不尊崇「虛而無誕任之失，實而無慘劃之過」的《老子》。申綽並於「無為無不為」中尋得老子的本旨。

申綽除執筆撰作《老子旨略》，亦運用文獻集成之法，整理《詩》、《書》、《易》之訓詁，編成三次故，又作《春秋左傳例》，深明於《儀禮》。被譽為朝鮮樸學之宗。申綽亦收集漢代金石碑榻文，以漢隸淨書，編成一冊皇皇巨秩的手稿本《漢隸》。申絢為申綽《詩次故》所撰跋文中，引用申綽之語如下。「吾之書主於古而略於義。通其訓者，義可知。次止於唐，為其近古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一寸之句，吾必舉三重根據，珍重其言也。以古訂古，其理在古，古之有也，非吾有也。美者自美，吾不與其美，惡者自惡，吾不與其惡。唯知其愈古者，為愈貴愈微而已。」申綽的江華研究可以「以古訂古」通稱之。排斥毫無根據的立論，故可稱其為實證主義。申綽雖未陳述己見，仍托古注的引用與安排以為己見。申綽在經學領域中不追隨過去以朱子之說為中心的學說，嘗試重新以「吾心」解釋經文。他試圖擇取經典的古注，使經文的微言自然彰顯，藉此解構過去對經文的教條式解釋。

李匡師在〈論東國諺解吐〉中討論諺吐，開拓朝鮮語學及古典文獻學的新研究領域。此一學問經李令翊、李忠翊二人，為鄭東愈、柳僖（1773~1873）所繼承。柳僖向鄭東愈

學習正音學，於 52 歲的 1824 年著作《諺文志》。又南廷和研究文字學，李忠翊參與梵語辭典《真言集》的重刊。

柳僖務農同時，亦行儒醫以維生計，留下分量龐大的《文通》。謄抄《文通》中《觀象志》、《周髀（算）經章句釋》、《律呂新書摘解》、《樂律管見辨》者，今收藏於延世大學圖書館。而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受託，收藏含《方便子句錄》、《方便子文錄》、《方便子書牘》等柳僖文集在內的《文通》的絕大部分。柳僖留下文字活動相關資料、地方行政資料等，大量生活文化史方面的資料。李匡師的孫女，即李肯翊之女，隨丈夫尹涉（尹衡喆）自殺後，柳僖作通文請立旌閭門，並將該通文收於自編文集中。在 1808 年 5 月晦日所作〈抄近藝雋選書後〉中，指科文雖為通俗之文，然不可忽視其價值。柳僖為懷才不遇的人物與閭巷之人撰寫多篇傳；為女性作行狀、祭文、壙銘；為夭折之子留下壙志。柳僖也相當關心從事民間生計的工匠或商人、從僕的生活，將他們放入寓言的創作中，或是從他們的生命中找尋具教訓意味的要素。〈剝匠對〉（1807）、〈釋僮〉（1807.12）、〈明賈〉（1808.4）、〈板街店遇篩商記〉（1819）等文，即為此例。柳僖更寫下對盜俠的見解，雜錄盜俠軼事，作〈盜俠敘〉（1812.10）。

柳僖於 1801 年 3 月讀清朝文人李紱的文集《穆堂集》，寫下讀後感。李紱著作有《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等。柳僖嚴斥李紱批評作《學部通辨》的陳建無知，其實李紱才是無知之人。柳僖對陽明學關注極深，應已通讀李紱的《穆堂集》。而柳僖於 1803 年 7 月左右作〈辨倭學湖學〉，批判性理學的湖論。即柳僖認為，韓元震的湖學將氣放在理之前的說法，與倭國伊藤維楨的說法彼此相符。據柳僖的見解，倭學與朱子之說一較高下，而湖學則私下反對，可說湖學自伊藤維楨的倭學取得發展的契機。柳僖於〈書古今文訟疑〉中，同意毛奇齡的說法，主張偽古文非偽作，而是真正的古文。對湖論的批判，以及對古文尚書的論證等，可見柳僖關心當時的主流學問，並且將當時的難題視為自身的課題。

柳僖相當關注民間信仰與修練。在 1796 年的〈關天主學策〉與之後的〈功過格辨〉（1798?）中，展現出他對於民間思想的個人批判意識。在 1803 年 7 月所寫的〈洪氏喚醒辨〉中，提及察訪洪義泳為喚醒其弟子而作短歌，甚至進一步刊印短歌的事實，並批判「喚醒」之學是受陸象山（為指稱王陽明而使用）「頓悟說」的誤導而產生。柳僖儘管在該文中批判陸王學，然而表現對民間「喚醒」之學的關注本身，也相對顯示出其陽明學的傾向。

柳僖同樣重視作為漢學基礎學的小學。柳僖在《諺文志》外，亦著有《物名攷》。³⁸1820 年完成的《物名攷》，是李晚永於 1807 年編成《才物譜》後，請柳僖指正，柳僖經過長久

³⁸ 1820 年完成的《物名攷》，為李晚永於 1807 年編成《才物譜》（1798 年完成）後，對柳僖提出指正，柳僖經過長久研鑽而完成此書。沈慶昊：《韓國漢文基礎學史》1-3（首爾：太學社，2013，2 刷）。

的鑽研而完成。柳僖以李晚永《才物譜》中地部的一部分與物譜的一部分為考察對象，將物名區別為有情、無情、不靜、不動四大類別，復以垂直分類法細分，考察各個項目，編成《物名攷》，亦稱《物名類攷》。該書以《才物譜》為主，選定 7000 餘個物名添加注釋，在注釋中約有 1600 個朝鮮語的對應語。

陽明學可以說重視人類主體提升的體驗，而江華學派知識分子並未如陽明學談論精神提升的體驗。江華學派知識分子反而著力於批判程朱學的虛偽，及指謫掌權政治權力之黨派的負面思惟。又陽明學以庶民大眾為講學對象，欲實踐人類的平等與尊嚴，而江華學派並未具備如此寬廣的思維視野。儘管如此，江華學派在批判虛假、喚醒實心、表現惻怛之心等新的局面上，取得與朝鮮教條主義式的朱子學全然不同的成果。

六、結語

以上主要以筆者的論著為中心，論述明清文學及學術對朝鮮文學與學術的影響。論述內容概括如下。

（一）第二節「明清文學與朝鮮漢文學」

1、朝鮮朝廷與知識分子起初否定明代學術，亦未積極覆刊明代文集。至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始接受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文學，刻劃自我獨特的文學世界。海東樂府體採用連作詠史樂府的形式、體例，並成為朝鮮私撰史書的一種形式，此文體在朝鮮發展的過程中，曾參考李東陽的《擬古樂府》。又朝鮮文壇在發展「體以代變」與「格以代降」之觀點上，亦多受胡應麟《詩藪》的影響。

2、朝鮮起初重視錢謙益的古文，對其編《列朝詩集》時將朝鮮漢詩置於明詩史中，皆給予正面的評價。直至十八世紀末，朝鮮知識分子始確認清代批判錢謙益的事實，對錢謙益展開批判。朴趾源以錢謙益的〈跋皇華集〉、〈跋高麗板柳文〉為中心，提及錢謙益對朝鮮文學的嚴苛批評，並對此反駁。

3、正祖批判包含陽明左右派與毛奇齡在內的偽經害經之流的「豐坊孫鑛之派」、過度偏重考證學的「楊慎季本之派」、善蟲刻雞距之操觚家的「七子五子之派」等三大派，然上述三派著作於朝鮮後期被廣為閱讀。尤其公安三袁對朝鮮漢文學的發展影響至深。袁宏道的文學啟迪民族文學意識的成長、對文學真情的重視、漢文敘事領域的擴大；袁宏道的

奇文成為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思考實在與虛幻問題時的參考。然而朝鮮知識分子與袁宏道的佛教說，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又朝鮮後期居於首爾居住的文人，多批評明末小品非「冠冕佩玉之文」。

4、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偏好描寫市井生活與人類個性的新文體，如《虞初新志》所收散文，呼應與格調說抗衡的王士禛神韻說。然而朝鮮後期知識分子無法完全自外於憂患意識，故批判王士禛的神韻具有矯飾的哀傷性。另一方面，丁若鏞批判王士禛《王文簡古詩平仄論》與趙執信的《聲調譜》，在長篇七言古詩的平韻到底與仄韻到底形式中，對出句與對句（落句）的平仄要求過於煩雜，並提出與此相異的歸納理論。

（二）第三節「朝鮮的知識風土變化與明清學術」

1、朝鮮朝廷以明永樂皇帝勅撰之《四書大全》與《五經大全》，作為朝鮮儒學的基本教科書。《四書通義》（《重訂四書輯釋通義大成》）以甲寅字印頒（日本蓬左文庫藏），而在《四書大全》頒行後，《四書通義》遂逐漸為人淡忘。朝鮮經學初以關照「義理」的方法為主，到了朝鮮後期，在經典解釋上，逐漸應用文字學知識進行訓詁作業。此時，多參考清代勅撰本《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與《欽定詩義折中》等書。徐有榘則欲以欽纂本為參考，編成《十三經傳說》。

2、清初浙東學派的毛奇齡被視為標新立異的人物，受到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嚴厲的批判。正祖為擁護朱子學，積極防範毛奇齡經學說的散布。然而在十八世紀末，李德懋雖譴責毛奇齡批判程朱學，卻也在真偽論的觀點上採用毛奇齡的經學說。毛奇齡的經學研究方法影響朝鮮後期部分知識分子至深，尤其丁若鏞在深化自身經學思想的過程中，對毛奇齡的學說有了批判性的接受。

3、顧炎武的學問對朝鮮後期學者帶來不小的影響。從朝鮮後期的著作來看，在地理考證與歷史論、闢異端論與經學論、經世論等各個領域，多有引用顧炎武學說的事例。惟朝鮮知識分子未研究漢字的上古音體系，故無心於顧炎武的韻學。又顧炎武主張學術上應經學、史學並進，而該主張對朝鮮後期知識分子應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丁若鏞批判顧炎武的《日知錄》不成義例，亦懷疑其高談闊論的目的。

（三）第四節「朝鮮後期小學、名物度數學與明清學術」

1、朝鮮大抵稱初學者的修身科目為「小學」，僅有少數學者意識到作為 Philology 的「小學」。正祖於 1792 年向《奎章全韻》編纂者頒布〈文字策〉，命編纂人員為小學定義。毛奇齡批判朱子妄稱灑掃應待之節的教本為「小學」，而正祖要求文臣對此提出反對的論點，文臣則認為修身學與字學應當結合。另一方面，直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欲參考清代考證學，樹立說文學的趨勢，惟提及段注的人物僅為少數。朴瑄壽的《說文解字翼徵》依《說文解字》順序列出鐘鼎文，並以此為依據解說文字。

2、朝鮮知識分子多藉由類書查驗知識事項，亦親自將資料分門別類，編成個人的類書。朝鮮時代系統地整理、分類文物制度事項與文翰用語的方式，最先是參考中國的類書，之後逐漸建立分類標準。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即《翰墨全書》）、彭大翼《山堂肆考》、章潢《圖書編》、王圻的《三才圖會》與謝肇淛的《五雜俎》等書，皆為朝鮮後期知識分子嗜讀之書。至十七世紀，始自清國傳入《淵鑑類函》、《古文淵鑑》、《佩文韻府》。

（四）第五節「朝鮮江華學派與陽明學的關係」—概述朝鮮陽明學

派之江華學派如何受陽明學影響，並發展朝鮮學的事實

江華學派與陽明學不同，極少談論精神的提升，不具備可包容庶民大眾的思想視野。儘管如此，江華學派在批判虛假、喚醒實心、表現惻怛之心等新的局面上，仍取得與朝鮮教條主義式的朱子學全然不同的成果。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若鏞：〈寄二兒〉，《與猶堂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81 冊，第 1 集，詩文集，第 21 卷，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 年。
- 入矢義高：〈賴山陽〉，收入中村幸彦編：《近世の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
- 入矢義高：〈賴山陽〉，收入中村幸彦編：《近世の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6 年。
- 正祖：〈文學 1〉，《弘齋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267 冊，卷 161，日得錄 1，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年。
- 安鼎福：〈天學考 乙巳〉，《順菴先生文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30 冊，卷 17，雜著，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0 年。
- 李宜顯：〈陶峽叢說〉，《陶谷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181 冊，卷 28，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年。
- 張潮輯：《虞初新志》點校本，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二、近人論著

- 中純夫：《朝鮮の陽明学——初期江華学派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 年。
- 住吉朋彦：〈《翰墨全書》版本考〉，《斯道文庫論集》第 42 輯，東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2008 年。
- 沈慶昊：《江華學派의 文學과 思想 (3) (江華學派的文學與思想 3)》，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1995 年。
- ：〈恒齋李匡臣論〉，《震檀學報》84 號，首爾：震檀學會，1997 年。
- ：〈燕岩論錢謙益〉，《中韓人文科學研究》第 2 輯，首爾：中韓人文科學研究會，1997 年。
- ：〈朝鮮後期 學問研究方法論의 分化와 毛奇齡 批判 (朝鮮後期學問研究方法論的分化與對毛奇齡的批判)〉，《東洋學》第 29 輯 (首爾：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1999 年。
- ：《조선시대 漢文學과 詩經論 (朝鮮時代漢文學與詩經論)》，首爾：一志社，1999 年。
- ：〈丁若鏞의 詩樣式 選擇 (丁若鏞的詩樣式選擇)〉，《韓國漢詩의 理解 (韓國漢詩的理解)》，首爾：太學社，2000 年。

- 〈江華學의 虛假批判論 (江華學的虛假批判論)〉,《大東漢文學》14,慶山:大東漢文學會,2001年。
- :〈朝鮮後期 散文中 나타난 虛幻과 實在의 問題 (朝鮮後期散文中虛幻與實在的問題)〉,《漢文散文의 內面風景 (漢文散文的內面風景)》,首爾:昭明出版社,2002年。
- :〈朝鮮 (李朝) 後期漢文學の一特徴: 袁宏道の理解を中心に (朝鮮 (李朝) 後期漢文學的一個特徵—以袁宏道的理解為中心)〉,《アジアのなかの韓國傳統文化: 朝鮮朝の知 (亞洲中的韓國傳統文化: 朝鮮朝的知)》,九州: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度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センターシンポジウム (2003年九州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論壇),2003年。
- :〈江華學派의 假學批判 (江華學派的假學批判)〉,《陽明學》13,首爾:韓國陽明學會,2005年。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古學彙刊》,上海國粹學報社印行,1913年。
- 河至映:〈王世貞과 朝鮮 中·後期 漢文 散文 (王世貞與朝鮮中後期漢文散文)〉,《韓國漢文學研究》57,首爾:韓國漢文學會,2015年。
- 金斗鍾:《韓國古印刷技術史》,首爾:探求堂,1981年。
- 都賢哲:〈《經濟文鑑》의 引用典據로 본 鄭道傳의 政治思想 (從《經濟文鑑》的引用典據看鄭道傳的政治思想)〉,《歷史學報》165,首爾:歷史學會,2003年。
- 鈴木虎雄:〈神韻說之特徵〉,《中國詩論史》中譯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 鄧長風:〈虞初新志的版刻與張潮的生平〉,《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鄭亨愚,尹炳泰:《韓國冊版目錄總覽》,首爾: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79年。
- :《韓國的冊版目錄》,首爾:保景文化社,1995年。
- 鄭寅普:〈朝鮮古書解題〉,《蒼園鄭寅普全集》1,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年。
- :《陽明學演論》,《蒼園鄭寅普全集》2,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1983年。
- 鄭寅普著,洪以燮編:《陽明學演論》,首爾:三星文化財團,1972年。

The Acceptance of the Literature and Stud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ase in the Joseon Dynasty

Sim Kyung-ho^{*}

Translated by Lin You-yi^{**}

Abstract

Scholars and monks of the Joseon Dynasty are used to write articles and poe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grammar, and elaborate their imagination and thought by the same kind of wa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the importance part has been keeping changing.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valued Confucian code of ethical behavior the most at first, but gradually turned to 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human being. Therefore, the awareness to the real lives was shown constructively by the scholars with their works or books.

Key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ademic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ology in Korean, acceptance, philolog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Koera University / Senior writer,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Koera.

^{**} Double bachelor degree major in Kore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Korea University. KGSP(Korea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Award winner.

